

學子 古經

—— 十一朝学术史新证

王锦民 著

华夏出版社

古 学 经 子

——十一朝学术史新证

王 锦 民 著

华 夏 出 版 社

1996 年·北京

(京)新登字 04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学经子:十一朝学术史新证/王锦民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9

ISBN7-5080-1039-6

I. 古… II. 王… III. 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研究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5193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25印张 233千字

1996年9月北京第1版 199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册

ISBN7-5080-1039-6/K·092

定价:18.50元

序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其学术亦源远流长。自先秦迄清末，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包括旧时所称的经、史、子、文、艺、佛、道等七大部类，同时也构成了中国学术史的基本研究范围。

中国学术史，顾名思义，乃是中国学术发生、变迁的历史。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实际上应包含“学”与“术”两方面。所谓“学”，目前虽无统一界说，但用于中国学术史之“学”，则可以明确的理解为：它是中国文化中所特有的，或在中国文化母体中产生和形成的学问总体。其主体或核心当为书志所概括的经、史、子、集四部。这一中国古代的学科分类，虽然有失笼统，但却一直是中华文化的最重要、最核心的四大部分。因此，学术史之“学”，当指中国旧有的学问之总和，它由众学组成，其中亦包括中国传统的“小学”在内，即文字、音韵、训诂及中国传统的文献学意义上的目录、版本、校勘等等。

从广义上说，“术”与“学”在其内涵上有相重迭之处。古代所谓“道术”、“儒术”之称，皆指道或儒的学问及方法。贾谊《新书·六术》即以“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为学问旨归。故古代“学”、“术”相通。有学不能无术，有术亦不能无学。既无学又无术者，直可谓之盲瞽矣。

有学术，即有学术发展的历史，此即一般意义的学术史。

从现代眼光看,中国传统学术史所涵盖的内容,实为现代分科学术史之总和。由于学科分类是一个不断体现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进化过程,故古代学科的分类,如七录或四部分类法,逐渐被现代科学分类法所取代。现代学术史的研究,是一种分科学术史的研究方法。同时,其内容亦扬弃了古代学术史所包含的诸如师承关系、目录版本等,成为单一性的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古今学术史研究方法的变迁及其涵盖内容所存在的差异,虽然体现了人类认识由浅入深、由泛到专的进化过程,但对于象中国学术史这种涵盖面极大的学科,其古代的方法仍有存在的价值和存在的必要。这首先是因为学术史研究中的目录、版本等问题不仅在古代研究方法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现代学术史研究方法中,也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二是古代学术的传授系统或师承关系,往往是学术流派发生、发展及演变的重要依据。

王锦民先生即是从上述两个重要环节入手,依据传统目录学的编排次序和中国历史上学术思想发生、发展、演变中的前后承续关系,介绍了从先秦至隋唐以前近一千年中的若干学术史的问题,撰成《十一朝学术史新证》一书。

学术史的研究工作难度甚大,其原因除前面提到的古今方法之异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古代典籍的艰涩与浩瀚。无论按着汉代刘向所著《别录》,还是依据《隋书·经籍志》所定之四部,都很难整理出一套能够囊括中国古代全部学术发展成果的古代学术史。尽管有人认为古代的目录学即可当作一部简要的学术史来读,但古代的文献目录学,充其量也是在宏观的意义上勾画一家一派的学术源流,很难深入到学术发展中的细微部分,因此不能摆脱古代学术研究方法的局限。

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再到《四库全书总目》，可以说在茫茫学海中为人们探明了学问的门径，但它们毕竟是重在文献目录的搜集，而非对学术史本身的研究。

近现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不断输入，西方文化中的近代史学观及其方法亦随之东渐，这给中国学术史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胡适和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首开风气。随之便有梁启超、钱穆二氏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胡、冯、梁、钱四子之书，皆受西方学术方法的影响，但比较起来，胡、冯二氏的中国哲学史，更多地采用了西方的方法，而梁、钱二氏的学术史，则更多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方法。这种分合，固然与他们本人的学养、眼光有关，而更多的则是受到他们所研究的客观对象的制约。一般的说，哲学多是义理之学，故其历史亦多体现为理论思维的内在逻辑发展。而学术史则是中国古代学术的发生、演变的历史，它更多地体现为一个时代学术源流的变迁或一个学派内部学术思想的分合起伏。哲学史可以写成哲学范畴的发展史，并可排除哲学家本人的历史经历或某些偶然因素，也可以不涉及哲学家的政治主张、政治理念等等。但学术史则不能。学术史包含的内容在外延上要比哲学史丰富和具体，而在内涵上却可以小而又小。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学术史是中国经学史或子学史的延续。它是最典型的“国学”或广义上的“汉学”（中国学）。它离不开经学或子学在时序上的传统关系，也离不开经学或子学所包含的内容。正是由于学术史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学术史的研究，要有中国传统的“小学”及中国传统文献学的基本功夫。也正是由于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学术史研究的难度。迄今为止，分门别类的学科史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而综合性的

从先秦至近代的“中国学术史”，却还没有一部。

多年来，王锦民先生不惧畏途，亦不求闻达，广涉博览，潜心钻研，孜孜以求古之所谓“为己之学”。其所著《十一朝学术史新证》一书，在经学与子学的范围内，将周秦以来迄六朝数十家之异说，审核真伪，考辨异同，去粗取精，既肯定其创见，又扬弃其谬解，并在此基础上，做了大量的考订和补充，实可为一家之言，对当前治经学史、哲学史、文化史及古代学术史者均有益益。

这部书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选题精当，重点突出。能够撷取中国经学和子学中一些重点和难点问题，融汇勾稽。其所选十一朝学术史中的五十则重大学术问题，都是学术研究不可逾越的难题，起到了对中国学术史研究的画龙点睛的作用。第二，引征广博，考旋周密，材料翔实，精于去取。此为学术研究的必备条件。第三，斟酌旧案，创立新说，既能接受前人成果，又不拘泥盲从。特别是关学术源流的考辨方面，力求提出新见解。第四，注意历代经学与子学的关系，及它们对中国文化其它门类的影晌，多能从文化视角审视中国学术的发展，尤其注意了经学对哲学、美学的影响。

综合上述特点，可以看出作者对学术史上的一些重大课题的着力之处及其所得。例如，关于“后定之学与郑王今古说”及“王弼易学之根源”两节。这些问题在历代经学史的研究中观点歧出，说法不一，而这些问题在汉魏之际学术变迁及魏晋玄学的起源等问题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在上述两节的论述中，揭示了汉末经学变迁所导致的“后定之学”的出现，而所谓“后定之学”又分别出于三个不同地域，即：荆州刘表、宋衷，洛阳王朗、王肃，河东郑玄。三个不同地域的“后定

之学”，虽均属汉末经学之流裔或学术变迁的产物，但却有不同的出发点，并表现出不同的倾向。由此作者得出结论：荆州、洛阳的后定之学是从今文统一古文，河东的后定之学则是从古文统一今文。二者立场截然不同，甚至对立。这些论证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汉魏之际经学演变的轨迹及其实际过程。作者从考辨“后定之学”的区域性、差异性入手，又进一步商榷历史成说，考辨王弼易学的来源。在以前的研究中，很多学者认为王弼易学受荆州学派影响，因而提出“宋衷—王肃—王弼为易学的同一传统流派，即荆州学派”说。而作者根据对王粲与荆州刘表的关系，及王弼易学与王肃易学行世的时间比较，认为王弼易学的根源不在荆州学派，亦不继承王肃，而是与蔡邕、董遇、荀爽等人的易学关系更密切。这是一个新见解。再如关于魏晋时期的才性之辨。按传统说法，魏晋时期的才性同异合离之争，乃是司马氏集团与曹魏集团政治斗争的产物。作者则提出才性之争的政治背景乃是魏末选官制度的变化，而此一政治背景并不完全与司马氏与曹魏的斗争相合。关于“才性四本”，作者亦做了新的解释，认为“四本”中的才性合离，“其所谓合，不是才性之合，而是才性同与才性异之合；其所谓离，不是才性之离，而是才性同与才性异之离”。这是发挥先秦名家“合同异”与“离坚白”的辩论方法，反映了名家思想在魏晋时期的活跃。作者推测，魏晋时期的“才性四本”，同异两本与政治有关，合离两本与政治关系不大，是校练名理的学术问题。这些都属于有新意的看法。此外，作者对先秦《周易》筮法、西汉易学的分际、洪范五行说的起源、新出土的黄帝帛书、先秦诸子源流等学术史上的重要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总之,王锦民先生的《十一朝学术史新证》一书,虽然还有一些值得深研和尚可商榷的地方,但已称得上是一部可观之作。作为一位年轻学者,能在世风浮华之下,潜心经籍,淡泊名利,厝心于学问之间,留意于道德之际,实为难能可贵,故为序。

李中华

1995年12月28日

目 录

序言	(1)
易与周易	(1)
左传国语筮法解	(6)
帛书易与田何易异传	(12)
西汉易学的分际	(20)
费氏易与古文易学之兴盛	(27)
后定之学与郑王今古说	(32)
王弼易学之根源	(38)
六朝易学名家	(44)
尚书与春秋前儒家	(49)
虞夏书与战国儒家	(55)
洪范与数度之学	(61)
洪范五行说的起源和传衍	(66)
汉代今文尚书与五行传	(72)
魏晋尚书学与晚书	(79)
诗的地域和年代	(86)
孔子与儒家传诗	(96)
四家诗与阜阳诗简	(102)
诗经学与诗学的分立	(110)
周礼的来历及传授	(115)

周礼六官与考工记·····	(122)
仪礼与周代礼乐文明·····	(127)
大小戴记·····	(135)
乐经与乐记·····	(141)
月令与丧服之学·····	(147)
春秋与三传·····	(153)
汉代左传的传承与兴衰·····	(160)
公羊大义与董仲舒·····	(165)
论语与孝经·····	(170)
讖纬与汉代经学·····	(178)
孔子与春秋儒家的兴起·····	(187)
孔子弟子四向·····	(193)
汉志著录儒家诸子·····	(200)
隋志著录儒家诸子·····	(209)
老子与老子书·····	(220)
管子经言与管子四篇·····	(227)
稷下四子·····	(233)
黄老帛书·····	(238)
汉志著录道家诸子·····	(244)
两汉老学之演变·····	(251)
隋志著录道家诸子·····	(255)
墨家源流考·····	(268)
名家源流考·····	(277)
法家源流考·····	(286)
阴阳家源流考·····	(295)
杂家源流考·····	(302)

隋志著录杂家诸子.....	(309)
浮华与魏晋玄学的地位.....	(317)
才性四本论的政治背景.....	(323)
名士与儒道.....	(329)
汉晋诸子论说.....	(336)
后记.....	(343)

易与周易

《周易》制作于何时？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把易和《周易》区分开，不能把它们看作一回事。易是起源于上古的一种占筮术的通称。《周礼·春官·太卜》云：“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可见从上古流传下来的易至少有《连山》、《归藏》、《周易》三种，《连山》、《归藏》也称易，这两种易和《周易》一样，有八卦和六十四卦^①。

《系辞》云：“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伏羲作八卦说，旧史上少有异议。由八卦重为六十四卦的人是谁，则聚讼纷纭。唐代以前关于重卦者计有四说：一为伏羲重卦说，王弼主之；二为神农重卦说，郑玄主之；三为夏禹重卦说，孙盛主之；四为文王重卦说，司马迁主之^②。郑玄《周礼注》引杜子春云：“《连山》宓戏，《归藏》黄帝。”如果《连山》由伏羲作，且《连山》已由八卦重为六十四卦，那么重卦之人只能是伏羲了，不可能是比他更早的人，因为八卦也是由他作的。这即是王弼伏羲重卦说之所据。这一说中包含了这样一种认识，即八卦与六十四卦可能是同时完成的。今人韩仲民更提出六十四卦在前，八卦在后的看法^③。孔颖达《周礼正义》据《世谱》等书云：“神农

一曰连山氏，亦曰列山氏，黄帝一曰归藏。”他认为《连山》的作者是神农，《归藏》的作者是黄帝。前者不同于杜子春。如果《连山》为神农作，那么重卦之人不能晚于神农。不过郑玄的神农重卦说并非按《连山》的作者而定，郑玄在其《易赞》及《易论》中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他把三易分属于三代。郑玄的意见是伏羲作八卦后，流传至神农始重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的流传在夏易《连山》作成之前。至于孙盛的夏禹重卦说，显然与郑云以三易属三代之说相合，《连山》为重卦之始，而其为夏易，故将之归诸夏禹。与郑玄不同的是孙盛不认为《连山》之前已有重卦。

王弼、郑玄、孙盛三说，均是就《连山》、《归藏》、《周易》三易总而言之。无论是将重卦者属诸伏羲，还是神农或夏禹，都超不出传说范围，很难找到确凿的证据来证实或证伪其说。保留它们的意义在于由此可以推测古人关于八卦与六十四卦之间关系的看法。而司马迁的文王重卦说，所述的角度与前三说不同，它仅就《周易》而言，不包括《连山》、《归藏》。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司马迁之说的错误是十分显然的，既然夏商的《连山》、《归藏》已经由八卦重为六十四卦，何必要待文王而后重呢？除非否认《连山》、《归藏》确实是周以前的古易。但即使如此，考古资料亦证明，筮法的出现，最迟不晚于商代武丁时期，且在文王以前或同时代的殷人已经广泛使用重卦筮法^④。所以，说文王是重卦的第一人，难以成立。但是，如果专说《周易》，司马迁的看法则不可遽非。文王虽然不是重卦的第一人，但确曾进行过重卦的工作。《史记·周本纪》云：“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这里说的“易”仅指《周易》。司马迁的看法可能来源于《系辞》，

《系辞》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时邪？”这里所说的“易”显然也仅指《周易》。

从考古资料中我们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在文王的时代，东方的殷人的易已经普遍采用了重卦筮法，而西方的周人的易还在使用比较落后的单卦筮法^⑤。周人采用重卦筮法可能自文王始。文王在殷事纣王，后又为纣王囚于羑里，先后在殷多年。在殷期间，文王学会了殷人的重卦筮法，并借鉴殷人的重卦筮法将周人旧有的单卦革新为重卦，这就是文王重卦说的真相。文王归周后，把他制作的新易传授给周人，遂为《周易》之滥觞。孔颖达《周易正义》云：“《周易》称周，取歧阳地名，《毛诗》云：‘周原膋膋’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时，正在羑里，周德未兴，犹是殷世也，故题周别于殷。此文王所演，故谓之《周易》，其犹同《周书》《周礼》题周以别余代。”孔氏所论至确。文王以前的易不能叫做《周易》，或者说《周易》的制作自文王始。

周人的易经文王革新之后，并不就是今本《周易》。今本《周易》的制作自文王始，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完成。按《周易》经文结构看，最早确定的当是卦名。周人用八卦占筮，八卦当原有卦名，文王既由八卦演为六十四卦，随即定下六十四卦的卦名亦是很有可能的。卦辞、爻辞的编纂则当略晚一些。卦辞、爻辞的来源是以往占筮所得的筮辞。《周礼·春官·占人》云：“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筮辞因此得到保存，其中应验的筮辞用来作为以后占筮的参考。不过，筮与辞总是要先筮后辞，文王创立新易后，必须运用一个时期才可能积累足够的筮辞，而在此之前用作占筮参考的只能是以往的殷人的占筮材料。文王的新易在筮法

上取自殷人,同时选取殷人的筮辞作为占筮参考,情理上亦说得通。

在周人自己的筮辞积累到足够的数量之后,卦辞、爻辞的编纂者开始尽量选用周人自己的材料,但仍有不少殷人的筮辞保留在定本的卦辞、爻辞中。比如《周易》乾卦的爻辞,描述龙的运动变化,近人高文策认为乃是记录殷人所观测到的星象,龙的运动变化实际上是“角一心一箕”星团一年中的运行情况。高氏试图证明,这样的星象记录只能是在殷末安阳地区观测的结果^⑥。如果高文策的考证是正确的,那么乾卦的爻辞即是取自殷人。此外《周易》大壮卦云:“丧羊于易”,既济卦云:“高宗伐鬼方”,泰卦与归妹卦云:“帝乙归妹”,等等,均是可以考知的殷人故事,这些爻辞也是取自殷人。

在卦、爻辞中保留殷人筮辞的另一个可能的原因与《周易》最后的定本过程有关。《周易》的制作始于文王,终于何时呢?学术界于此多认为周初已完成,《周易》晋卦云及康侯,康侯即康叔,名封,武王同母少弟,同公平管蔡后,封于卫。此一史实被学者据为上限,即《周易》之定本不早于康侯。《周易》的定本与康侯有没有关系呢?这个问题值得注意。《周易》中述周人故事,明确可考的除文王外唯有康侯。晋卦云:“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这一记载不会是偶然引及的故事,而是筮人为康侯马政占卜时的筮辞,选编晋卦卦辞的人应该见到过康侯的筮辞记录。什么人最有可能见到过康侯的筮辞记录呢?最自然的推论即是康侯的筮人,所以说康侯的筮人很可能参与了《周易》的定本过程。《史记·卫康叔世家》云:“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殷墟。周公旦惧康叔齿少,

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可知康叔领殷墟，求殷人，受殷文化的影响很大。如果康侯的筮人参与了《周易》之定本，那么，在《周易》中保留殷人筮辞以及记载康侯故事也就顺理成章了。

〔注释〕

①汉时犹见《连山》、《归藏》二易，桓谭《新论》云：“《连山》藏于兰台，八万言，《归藏》藏于太卜，四千三百言。”桓谭所见二易是否即春秋时太卜所掌之二易，已难考定。今传本《连山》《归藏》非汉时旧本，是南北朝人伪作。

②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第二“论重卦之人”，叙此四说。

③参见韩仲民《帛书〈系辞〉浅说》一文，载《孔子研究》1988年4期。

④参见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一文，载《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辑。

⑤参见张亚初、刘雨文，同上。

⑥参见高文策《试论易的成书年代与发源地》一文，载《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辑。高文发表后，即有庄天山著文表示不同意见，尤其对龙作为星象概念在殷代是否已有之问题提出质疑。庄文同见《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辑。